

# 艺术缝补乡村：本土美学视域下乡村文化复苏路径研究

聂嘉怡 吴梦涵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本土美学兼具原生性观看之道和反身性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之道基于自然意象、土地依恋与地方经验的深度耦合，强调乡村文化肌理的原真性修复；反身性观看之道通过“边缘之境”反思现代性危机，激活村民主体性以重构社群关系。二者为艺术赋能乡村提供方法论支撑，通过根感重构、慢速疗愈、互愈共生三重路径，系统修复文化断裂与城乡割裂。艺术介入以“缝补”为核心，既修复物理空间、激活村民文化认同，又构建城乡互愈网络，最终实现乡村文化自信与城乡共生共荣，为乡村振兴提供本土化方案。

**关键词：**本土美学；乡村文化；艺术乡建；艺术赋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以创新思维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在此背景下，艺术作为交叉学科，通过文化赋能与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成为落实战略部署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我国艺术介入乡村实践随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不断深化，呈现出从环境改造向文化创新、从个体自发向多元协同的转型趋势。既有研究虽肯定艺术乡建的积极作用，但多聚焦宏观战略或个体能动性，对乡村社区层面的动态机制探讨不足。乡村文化依旧面临双重困境。首先，乡村文化断裂问题加剧，具体表现为空巢社群蔓延、非遗失传及艺术介入的“悬浮化”；其次，政策实践亟待转型，需平衡经济与精神需求，构建尊重在地文化的修复路径。

本土美学作为一种基于本土文化、地方景观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活动，是地方性知识的美学表征。它超越了现代主义“普遍性、全球性和整体性”的危机<sup>[1]</sup>，具有开放性、连接性和灵活性。其内涵包含原生性观看之道和反身性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之道基于自然意象、土地依恋和本质与脉搏三重向度构建美学思想与经验，反身性观看之道则源于其“边缘之境”被重新看见，为全球文化生态平衡重构提供治理与疗愈方案<sup>[2]</sup>。在艺术乡建的语境中，本土美学至关重要，它能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助力解决乡村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

本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为如何通过艺术“缝补”修

复文化断裂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目标在于构建本土化的振兴路径，实现文化自信与经济回流的双赢。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本土美学的双重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与反身性观看——为核心，从空间修复、主体激活到城乡共生，系统应对文化断裂与城乡割裂进行艺术“缝补”乡村的研究。

## 一、根感重构：乡村环境的空间缝补

本土美学的“原生性观看”强调自然意象、土地依恋与地方经验的深度耦合，其艺术实践浸润于乡村的根感肌理。中国乡村环境普遍面临着文化肌理断裂的困境。从公共空间分析，乡村文化空间碎片化，表现为广场、街巷等公共空间的文化设施功能不足，形态与色彩质感难以满足村民精神需求。而建筑与景观的关联性弱化、民居建筑与周边街巷的文化景观联系缺乏、传统植物与建筑材料的原真性流失，导致乡土性消解，村民文化认同感降低，沦为“空心化”空间。

针对上述问题，艺术介入需以“原生性美学”为内核，通过空间修复与物质重构缝合文化断裂。四川美术学院在东升村改造中，以“柳”为主题挖掘农耕文化符号，利用废弃石材与木料搭建农耕文化园，既保留坡屋顶、穿斗结构等传统建筑形制，又通过木材、稻草等自然材料的生态性表达，重构土地依恋的审美意象。无独有偶，羊磴艺术社将废弃煤厂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保留砖墙肌理并嵌入本土竹编工艺，重构“乡愁地标”。此类实践将艺术介入视为本质与脉搏的延续。

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大致分为街巷形态的在地化修复、文化景观的原真性表达、民居与环境的共生关系重建三部分。街巷形态的在地化修复通过恢复传统街巷尺

**作者简介：**聂嘉怡（2001—），女，汉族，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度与青石板、夯土类的铺装材质，强化空间连续性。文化景观的原真性表达则以本土植物与乡土材料重塑景观，避免城市化异质植入。东升村通过“竹艺”文化墙与“柳趣”儿童乐园，将农耕符号转化为视觉语言，唤醒集体记忆。民居与环境的共生关系重建通过透绿设计、本土植被配置消解建筑与街巷的割裂感。海星村位于上海宝山区罗泾镇东北部，邨内的蟹逅馆外墙设计利用了垒石砌筑的传统工艺，采用小青瓦坡屋顶与垒石墙体，以融于村野林地之间，强化“天人合一”的乡土美学。

此类实践不仅修复物理空间，更通过根感重构激活文化认同。就如东升村“杨家坝·纪念碑”梯坎项目，将村民捐赠的犁、镰刀等农具嵌入护墙，以装置艺术再现农耕历史，使破败街巷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灵性地标”。其核心在于以本土材料与技艺为媒介，缝合断裂的文化肌理，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情感力量，最终实现乡村空间从“功能缺失”到“意义再生”的转型。

## 二、慢速疗愈：村民心理的认同缝补

本土美学的“反身性观看”强调以乡村的“边缘之境”反思现代性危机，通过“非介入的介入”激活村民主体性，从而修复因原子化与文化断层导致的社群疏离。这一实践逻辑的核心在于“慢速现代性”——即摒弃效率至上的发展模式，以时间沉淀文化认同、以协作重建社会关系<sup>[3]</sup>。羊磴艺术社历时两年引导村民共创出了“羊磴上河图”动画，以手绘长卷再现河流历史。村民在集体创作中自发讲述家族故事，将个体记忆编织为集体叙事，作品投影于河面，成为镇民夜间聚集交流的文化锚点。此类实践不仅唤醒乡土记忆，更通过“慢速”过程强化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形成情感联结的良性循环。

乡村文化的断裂通常表现为传统节庆仪式的神圣性消解与代际记忆的断层。艺术介入通过重构节庆仪式与手工艺协作，实现文化疗愈的深层目标。青田乡的“文化积分制”就通过动态评估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贡献，将积分与资源分配挂钩，规避了传统项目制的短期性，又通过长期激励强化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这种“非介入”策略尊重村民的文化解释权，使艺术成为激活内生力量的媒介，而非外来干预的工具。

村民心理的认同缝补还需直面现代性对“熟人社会”的冲击。乡村作为思想空间的居间性价值，体现在其能够通过情感网络重构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羊磴艺术社的实践中，艺术家放弃预设的艺术手法，转而将“生活即创作”的理念融入村民日常。村民曾用废旧煤车零

件制作雕塑，作品不仅成为公共空间的视觉焦点，更成为讨论资源利用与生态问题的对话平台。此类协作模糊了“艺术家”与“村民”的界限，使艺术成为平等对话的载体。段义孚（Yi-Fu Tuan）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在此得到延伸<sup>[4]</sup>——村民通过参与创作，重新建立对土地的情感依附，而不仅是物质依赖。

但艺术介入的“慢速疗愈”也面临着部分实践困境。一方面，城市审美逻辑的隐性渗透可能导致文化符号异化。忽视本土文化解释权的“介入”反而会加剧认同危机。另一方面，青年外流与技艺断层使项目可持续性受限。对此，青田乡通过“文化合作社”模式，将传统竹编、染织技艺转化为现代文创产品，并鼓励青年以“新乡民”身份返乡创业。这种“双向赋权”既保留了技艺内核，又通过经济收益增强了代际传承动力，形成文化认同与生计改善的共生关系。

总之，村民心理的认同缝补需以“慢速现代性”为方法论，通过时间沉淀、主体赋权与文化解释权的尊重，实现从工具化改造到情感共生的转型。其本质是以艺术为媒介，重构乡村作为关系性存在的审美价值，为应对现代性冲击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本土化方案。

## 三、互愈共生：城乡关系的结构缝补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文化断裂与价值失衡成为全球性难题，而中国艺术乡建以本土美学的特殊视角，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互愈共生”的解决方案。这种实践打破了城市对乡村的单向凝视与文化输出，通过审美资本的双向转化、多元主体的经验互参与本真性文化的动态守护，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编织起一张兼具经济韧性与文化温度的连接网络，使二者在互动中实现彼此疗愈与共同成长。

本土美学视域下的艺术乡建，首先通过审美资本转化激活乡村的文化经济价值，让城市消费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乡村的地域图腾、非遗技艺、民俗传统等原生文化符号，经艺术赋能转化为可传播的审美体验，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安徽宣城西村村以3D彩绘将徽派建筑与山水意象结合，使村落成为沉浸式艺术空间；云南鹤庆新华村依托银器锻制技艺，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并形成体验式旅游，将传统工艺转化为兼具艺术性与商业价值的文化IP。城市游客的到来不仅为乡村带来经济回流，更通过消费行为完成对乡村文化的认知重构——游客在非遗手作体验中感受物感论的心物交融，在田园生活中体悟生活的艺术化<sup>[5]</sup>，这些审美经验经其传播扩散，使乡村从被遗忘的角落转化为承载现代精神疗愈的

文化场域。

城乡之间的互愈性更体现在审美经验的双向流动与文化反哺。城市艺术家驻村计划搭建起双向技能交换平台。艺术家将当代艺术理念带入乡村，激活本土美学资源；村民则以对乡村生活的深刻理解反哺艺术创作，形成平等协作的创作共同体。这种互动打破了传统城乡文化交流中的等级差序。在重庆北碚柳荫镇“村社艺术·柳荫计划”中，村民在艺术家帮助下将日常空间转化为艺术场景，在提升乡村审美的基础上，让城市居民在“走人家”的体验中，感受到乡村伦理本位社会秩序的温暖。当游客在浙江南浔窑里村的儿童艺术友好村参与陶艺手作，或在贵州榕江的民俗直播中领略节庆狂欢的集体记忆，乡村的自然生态、社群关系与生活智慧，为其提供了逃离城市异化劳动的“精神栖息地”；而他们带来的现代消费习惯、创意思维，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乡村的文化更新。这种文化碰撞并非对抗，而是在差异中孕育新的可能性，使城乡主体在互动中完善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

艺术乡建对乡村“本真性存在”的守护，是缝补城乡文化时态断裂的关键。这里对本真的守护并非指固守传统，而是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乡村的核心文化基因。如云南元阳阿者科村通过保护“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生态系统与哈尼族传统民居，既留存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本色，也为城市提供了反思生态危机的鲜活样本。当城市居民在乡村体验中触摸到地方性知识的温度，其对乡村的认知便从他者想象转化为价值认同，而乡村也在与城市的对话中明确了自身的现代性定位——不是被动接受改造的客体，而是拥有独特审美体系与生活智慧的主体。这种双向的身份重构，使城乡从中心—边缘的对立走向共生共荣的平等协作。

在全球文化失衡的背景下，中国艺术乡建的本土美学实践提供了在地化疗愈的中国方案。以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表达拒绝审美殖民式的文化霸权，证明乡村文化并非现代化的牺牲品，而是人类多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市与乡村可以通过艺术实现互愈共生，二者也找到了共同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城市在乡村的自然与人文中寻回失落的“附近”，乡村在与城市的连接中激活内生的创造力，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实践，为全球城乡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启示。艺术作为“缝补”的丝线，不仅修复了城乡结构的裂痕，更在审美互动中编织出一张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

活力的共生网络，让城市与乡村在互愈中迈向更具人文关怀的未来。

### 总结

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以本土美学为理论根基，通过根感重构、慢速疗愈、互愈共生三重路径，系统回应了乡村文化断裂与城乡割裂的双重困境。乡村文化振兴需立足于在地性逻辑，通过价值、主体、产业、制度的协同整合，强化村民主体性与本土美学的融合，平衡传统保护与现代创新的关系。中国经验的实践向度体现为“非介入的介入”策略——以弱介入姿态捕捉本土文脉，通过艺术唤醒乡村文化本真性，构建情感共同体，推动乡村的有机新生<sup>[6]</sup>。

城乡关系的修复需以双向赋权为基础。城市通过非遗IP开发、艺术旅游等路径反哺乡村经济；乡村则以本真性文化为城市提供精神疗愈。然而，艺术介入需警惕工具化倾向，避免外来审美逻辑对本土文化的侵蚀。忽视村民文化解释权的项目往往加剧认同危机，而长期赋权机制则能提升青年返乡率与文化传承动力。

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继续探索数字化与本土化的深度融合，政策设计也需从短期项目制转向长效治理，将生态可持续性、村民参与度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乡村文化共同体的重构不仅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使命——唯有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张力中构建平等对话，方能实现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愿景，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兼具人文温度与学术深度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向勇. 乡村性的重构：中国艺术乡建的本土美学实践[J]. 民族艺术研究, 2025, 38(01): 5-13.
- [2] 向丽. 审美资本与非遗资源化的当代进路[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01): 137-148.
- [3] 卢茨·科普尼克. 慢下来：走向当代美学[M]. 石甜, 王大桥,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 [4] 段义孚. 恋地情结[M]. 商务印书馆, 2017.
- [5] 王沛. 以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实践与优化[J].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41(01): 109-112.
- [6] 向丽, 门磊. 本土美学与中国艺术乡建的当代转向[J]. 民族艺术研究, 2025, 38(01): 24-34.